

1940 年代台灣「鄉土意識」的底端 ——從「鄉土文學論爭」到『民俗台灣』的討論

張修愼

靜宜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副教授

摘要

戰前台灣「鄉土意識」的消長，從 1910 年代台灣民族運動開始以來，經過幾番的變動波折。「鄉土意識」一詞，在文學和民俗學的領域中，也同樣呈現階段性的意義。1930 年代初期，在台灣文學界發生的「鄉土文學論爭」中，我們可以清楚從論爭的思辨中，捕捉到台灣知識份子思考「鄉土」=「台灣」的主題性脈絡。1937 年日中戰爭開始之後，台灣即進入所謂「皇民化運動」的非常時期，隨後又有 1941 年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即便在此國際動盪的局勢中，同時期的台灣文化界，仍然積極進行有關「鄉土性」議題的論述。其中，文學界備受注意的就是被稱為「風俗作家」張文環作品「鄉土意識」的書寫；其他直接碰觸到「鄉土意識」議題的，還有 1941 年在台灣創刊的雜誌《民俗台灣》。提起作家張文環（1909-78），首先讓人想起的是作家多篇描繪台灣鄉土的文學作品。太平洋戰爭時期的 1941 年到 1943 年間，是張文環文學創作的巔峰期；問題是，1937 年台灣社會正如火如荼的實施「皇民化運動」之時，台灣文化界進如此深具「地方性」及「鄉土」色彩的表達，到底與帝國強調「鄉土運動」的本質有哪些關連性？「鄉土文學」與「民俗作品」登場的時間，都是台灣在戰爭時期實施「皇民化運動」的非常時期，戰前的「去除台灣化」，是日本帝國在面臨戰爭統合的前題之下，所必須面對的主題。在此政治氛圍中，1941 年之後在台灣文化界登場的「鄉土」作品顯然就不是那麼地單純。本文即是以此視點，再度探討戰前知識分子所表達「民族意識」和「鄉土意識」之間的流動與從屬的關係。

關鍵詞：《民俗台灣》、張文環、鄉土意識、民族意識

壹、前言

大體上，就台灣的「近代化」完全承襲自日本現代化思想的事實而言，台灣知識青年心中，欲求新文化思想的根底，的確隱含著必須「吸收西洋文化使之與自己的傳統文化融合」的理念。

閱讀 1921 年創刊的《台灣青年》，可以明顯地看出知識份子提出的「台灣文化論」，的確是具備「民族主義」的意義。雖然此文化論的內容涵蓋了兩種矛盾的指向，一種是「台灣已經是有文化的地域」，另一種是執意「必須要開發新文化不可」的意圖；前者是處於台灣傳統社會儒家道德的影響下，求取保持傳統文化的範本，後者則是另一種執意「必須要開發新文化不可」的意圖，以向世界求取新文化與知識為前提，破壞傳統的思想，打破舊有陋習為志向。

換言之，就是「防衛民族性」的立場，以致於是「追求近代化」的兩階段性的理念考量；兩階段性的想法，可以明白看出戰前台灣知識青年心中，同時並存保護（防衛）舊傳統與建設（革新）新文化的兩相對立的理念。此「抵抗」與「接受」的狀況，清楚地表達了 1920 年代台灣文化界的心聲；同時也明顯地呈現了殖民地時期知識青年在「台灣空間」中欲求「民族意識」的複雜情緒與氛圍。

另外，有關台灣「鄉土意識」的議題，戰前與戰後的文化界都經歷過深層的討論。戰前台灣「鄉土意識」的消長，從 1910 年代台灣民族運動開始以來，經過幾番的變動波折。「鄉土意識」一詞，在文學和民俗學的領域中，也同樣呈現階段性的意義。1930 年代初期，在台灣文學界發生的「鄉土文學論爭」中，我們可以清楚從論爭的思辨中，捕抓到台灣知識份子思考「鄉土」=「台灣」的主題性脈絡。

1937 年日中戰爭開始之後，台灣即進入所謂「皇民化運動」的非常時期，隨後又有 1941 年的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即便在此國際動盪的局勢中，同時期的台灣文化界，仍然積極進行有關「鄉土性」議題的論述。此議題的框架內，筆者注意到當時台灣文化界幾乎不約而同地敘述了所謂「地方色彩」；文學界如此，美術界也有幾近相同論述的呈現（顏娟英，2004）。

其中，文學界備受注意的就是被稱為「風俗作家」張文環作品「鄉土意識」的書寫；其他直接碰觸到「鄉土意識」議題的，還有 1941 年在台灣創刊的雜誌《民俗台灣》。

提起作家張文環（1909-78），首先讓人想起的是作家多篇描繪台灣鄉土的文學作品，其中也有不乏改編成為舞台劇。太平洋戰爭時期的 1941 年到 1943 年間，是張文環文學創作的巔峰期；除了文學創作之外，1943 年他還和呂赫若、王井泉、林博秋、楊三郎等組織「厚生演劇研究會」；文學作品中改編成舞台劇公演，至今獲得佳評如潮的就是「閩雞」的演劇。

問題是，1937 年台灣社會正如火如荼的實施「皇民化運動」之時，台灣文化界進如此深具「地方性」及「鄉土」色彩的表達，到底與帝國強調「鄉土運動」的本質有哪些關連性？「鄉土文學」與「民俗作品」登場的時間，都是台灣在戰爭時期實施「皇民化運動」的非常時期，「去除台灣化」，是日本帝國在面臨戰爭統合的前題之下，所即須面對的主題。在面臨如此慘酷的政治氛圍中，1941 年之後在台灣文化界登場的「鄉土」作品顯然就不是那麼地單純。本文即是以此視點，再度探討戰前知識分子所表達「民族意識」和「鄉土意識」之間的流動與從屬的關係。

貳、初期「台灣民族意識」的萌芽

「民族意識」的問題是現代社會的夢魘，每隔一段時間就會出現。雖然現代社會對於『「民族意識」是甚麼？』的認識已經不像過去一般引領風騷，或許也有人根本不在乎或是認為已經成為過去。但是其中的意義和重要性對於當今的台灣而言，有如麥克阿瑟所敘述的一句話：「老兵不死只是暫時的引退」。

有關「民族意識」的意義，我們可以認為是一種思想。等視於對同一「信念」價值觀的認知，或是成就一群人在共同地理環境生活的條件也是無庸置疑的；甚至視「民族」（nation）是一種政治共同體也毫無疑問。本文中所談論的關於「民族意識」可以思考為「台灣意識」，即使現在住在台灣的人徘徊於自己是中國人或台灣人的迷思中，無法清楚表達自己的

認同也大有人在，這個「認知」完全是讓自己的自由意識所左右。但是，不置可否的國民有共同認識的自覺的話，國家的未來發展比較可能順利推展的。今天我們所談論關於「台灣意識」的議題是屬於台灣思想史的領域，內容非常的錯綜複雜。在台灣的歷史中，關於「民族意識」的形成分成幾個重要階段的過程，「民族意識」完全依照社會變化而其解釋多少有所變動。

日治時期的 50 年，到底台灣知識份子如何對「台灣意識」做出說明呢？50 年的日本統治，在進入戰爭時期之後有哪些變動？之間消長關係又是如何？這個問題的解答就是前言所提對「民族意識」的解釋。關於「台灣意識」（Taiwan consciousness）這個語言本身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個意識的生成對台灣人來說，卻包含非常複雜的歷史要因。

簡單定義「台灣意識」就是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意思；對台灣人來說是一種思想的認知，可以解釋為認識「自己是台灣人」的意識（identity）的意涵。在台灣歷史中的「台灣意識」或是對台灣人而言的「民族意識」，經常是隨著社會和歷史的變動，在解釋上有所不同；在某一時期的台灣，對「民族意識」¹或「地方意識」²或「鄉土意識」³等的表現也是有的。

以台灣歷史觀之，關於「台灣意識」的形成，可以由以下幾個階段來說明。根據 1895 年的日清講和條約，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當時的「台灣民主國」也訴諸抵抗運動，但是對其中「台灣意識」是否確實存在？的這個疑問其實是值得深思的。日本人從古代就被稱為「倭人」，因為日清講和條約的締結，台灣在一夜之間成為「倭人」的殖民地。當時在台灣和清國本土也一樣實施科舉，知識份子深受四書五經儒家傳統思想的影響。因此他們對殖民政府的抵抗，不是把台灣視為祖國的意識，被認為只是單純對異民族的抵抗而已。如此的意識對清國來說並不包括歸屬意識或政治性的動機，被認為是單純文化性的認知和對本土血緣的認識而已。

¹ 漢民族意識。

² 清朝的台灣領有是在 1864 年，對清朝來說台灣是一個「省」，台灣對中國來說是一個「地方」。

³ 故鄉意識。

在陳其南（1987）《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的研究中，指明台灣漢民族的移民社會就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再現，「移民社會」的本質幾乎承繼了傳統母社會的型態。也就是說，漢民族在移居台灣的同時，也承襲了從日常生活習慣到書房教育等種種制度⁴。台灣初期的狀況因為清國的消極統治，再次讓土匪盜賊盛行，重點只限於防止成為反政府（反清復明）勢力的根據地。本來，對於清國的台灣反亂事件，從康熙 60 年（1721）開始以來到同治年間（1806）止始終沒有斷絕。

其原因，當然可以考慮清國的政策變化，陳其南的研究中，說明其原因主要是台灣的漢民族社會，是從支撐傳統的母系社會所持有的本籍中解放；其原因在於新的移民環境裡，架構新秩序的過程中所產生的意識逐漸加強之故。雖說如此也無法一夕間改變，1895 年成為日本殖民地之後，受到祖國的影響仍然是強烈的。其中之一就是現在台灣也看的到的祖先崇拜，根據相關資料的統計，台灣祖先崇拜組織的大幅成長，大約是在 1895 年到 1912 年之間。1895 年之後，台灣因為成為日本的殖民地與中國的交通有諸多的限制，之後在本籍的中國所實行的祖先祭拜習慣也逐漸無法實行，這是台灣獨自的祖先崇拜組織急遽增加的原因。

當時台灣人對中國的意識不是國家或民族意識，單純只是一種追求變質性的「文化認知」而已，在這個「文化性認知」的類型，我們最可以強烈看到的是「鄉土認知」和「戶籍認知」的兩種類型。換言之，「鄉土認知」是認為自己祖先的墳墓在哪裡即把此地視為故鄉的一種認識；「戶籍認知」則是以自己的戶籍所在地當作自己的出身地的一樣的認識。藉著這兩種類型考慮為當時的「中國意識」或「祖國意識」也是可以的。

但是，1895 年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之後，對台灣「意識」的改變也開始產生變化。當時為止從中國各地移民到台灣，對於自己出身地的認知也從當初的地方意識轉變為針對統治者的「抵抗意識」。在這個階段對日本統治抵抗性的「民族意識」，相對來說就是一種「台灣意識」；也就是說，在日本統治的 50 年間，統治者是日本人，被統治者則是台灣人和原

⁴ 相當於日本寺子屋的結構。

住民，這個時期呈現的「台灣意識」被認為是存在於台灣空間內的「民族意識」。

因為在「台灣」空間內生活，對應宗主國的政策相對應產生的情緒，逐漸從原鄉的中國轉到實質生活地的台灣，對日本統治者的抵抗意識也逐漸強烈；台灣在 1915 年的「西來庵事件」之前的抵抗，是完全可以說明其中的狀況。另外，黃美娥的傳統文人研究中，舉出台灣文學的自律性之真正獲得在地台灣人的重視，其實是始於日治時期；其中重要的政策就是廢除科舉與大興詩學有關，其中可以具體地由「書房」和「詩社」來說明（黃美娥，2006）。另外，殖民地統治下重要的「國語教育」也是無法漠視的，但是透過國語（日本語）推進同化教育的同時，台灣本來的教育機關依然存在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譬如台灣成為日本的殖民地兩年後的 1897 年，台灣總督府對台灣書房實施調查，可以確認當時的書房數有 1707 間（吳宏明，1983：46）。之後，透過總督府教育令的實施，可以看到書房數有減少的傾向，只是中期到 1937 年日本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後，書房的制度也沒有完全消失。吳宏明（1983：46）的研究指出，台灣未認可的書房在日本統治下沒有完全絕跡，日本統治下在台灣實施的漢文教育依然存在，仍然持續受到中國的影響。同時，以書房設立的目的和教育內容來看，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台灣知識份子的意識。1902 年（明治 35）5 月 15 日的『教育時論』中，關於當時台灣所存在的書房以下的記載：「與書房和內地的寺子屋酷似，是台灣重要的初等教育機關」（吳宏明，1983：44）。

換言之，台灣的「書房」和日本寺子屋一樣訓練讀、寫書信的寫法等，甚至也教導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算盤。關於書房中所教導的內容，在「台灣文化志」中，強調一般是以「科舉」為考試目的的（伊能嘉矩，1965：57-59）。其中的基準沒有一定，但是學生一般以中國的古典「四書」、「五經」、「史記」為學習的內容，其他還有關於習字作文等地練習，被認為在書房中所學習的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日本「國語」教育是有絕對的對抗關係，相當廣泛的影響了台灣知識份子。

其他詩社的存在，對知識份子的影響也是無庸置疑的，因為詩社所傳

達的使命是傳播中國的傳統文化。根據陳昭瑛的研究，從 1920 年代開始在台灣文化啟蒙運動和民族運動中活動的中心人物的經歷看來，幾乎都是詩社會員的事實是非常明顯的。知識份子對異民族的抵抗意識，於台灣民間中所接受的儒教的倫理幾乎是一致的（陳昭瑛，1999）。因此，對初期的台灣而言，思考當時的「台灣意識」解釋為「漢民族意識」也不為過。

但是，歷史脈絡的流動中，1895 年之後，經過日本現代化的教育之後，連帶國際情勢的改變所帶動的台灣人思考就變的錯綜複雜。尤其，殖民統治中葉開始台灣知識份子意識開始起了變化，在台灣知識份子的意識變化和社會變革的異動中，可以看出社會運動組織。台灣知識份子秉持著「啟蒙」角色的「自覺」，開始奉獻對社會積極的關懷；因此在台灣遵循殖民社會的變革，台灣知識份子的「認知」也是多樣的。特別是 1920 年代以後，接受新式教育的台灣知識份子，依據社會的變革在「民族意識」上有著強烈的變動。

參、從「民族意識」到「鄉土意識」之間

我們完全可以意識到「鄉土意識」這是一種「文化類型」的表現。從台灣早期是移民社會的事實來看，人民要在一個固定的區域中生存，或許本來具備多種的地域性，但是從發展到需要認定一個區域，生活者體會要在同一區域生存，必然要有固定模式的認知。換言之，從移民開始到在地生根發展出一種模式，或是面對一種「共同體」的事實，也是絕對需要時間的。

戰前台灣「鄉土意識」的發展過程中，和「台灣意識」的生成，的確有密切的關聯；同時「鄉土意識」的形成，和民族運動的消長，也有深層的關係。一開始，以台灣知識份子為主體的「台灣民族運動」的路線，完全沿著「台灣本意」，甚至是以「台灣鄉土文化」為主體而進行的。甚至，1937 年之後，殖民地台灣也開始實施「皇民化運動」，終至 1945 年戰敗為止，戰爭時期帝國力求全國上下「協力戰爭」的氛圍中，台灣知識份子是如何對應帝國的殖民政策？創造出「鄉土意識」？以下是幾個問題的探討。

台灣政治史上，「西來庵事件」的發生，使台灣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總督府的武官統治轉變為文官統治，1920 年代的「新」知識分子也開始不斷為台灣發聲；一開始雖然停駐於啟蒙性政治議題的論述，但是 1920 年代知識份子所主導形成的文化思潮，依照「新·舊文學論爭」達到一定的階段。也因為 1930 年代之前台灣知識份子的活動，主要擔負「社會啟蒙」的使命，因此台灣文學活動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社會運動」的一環而發展。

一般我們說文學的「啟蒙」意義，就是台灣新文學的主要目標——讓大眾識字。1920 年代讓台灣在殖民抵抗從武力走入文化的分歧點就是「新舊文學論爭」。既然武力抗爭不行，只好採取文化政治的方式，而政治抗日的首要工作便是推行新文化運動；而要推行文化政治的抗日，當然必須讓大眾識字。台灣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文學上橫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的理個文學論爭，其實在思想邏輯的连接上有其先後的順序。

1921 年，從雜誌《台灣青年》創刊以來，新一代知識分子為了普及教育，首先思考的便是文字使用的問題。之後，《台灣青年》改版成《台灣》之後，黃朝琴和黃呈聰正式以〈論普及白話文的新使命〉及〈漢文改革論〉的兩篇文章，全面掀起白話文改革運動；在此因為題目及篇幅的關係，雖然無法詳細論述「新舊文學論爭」的經過，但是包括 1921 年台灣文化協會創設的台灣人所思考的目標，甚至之後的《台灣民報》等一連新知識份子的發言投稿，不外乎都是為了台灣為主體性的思考。

「新舊文學論爭」的過程中，雖然知識份子之間不斷有爭執，但是無庸置疑的事實，就是「台灣新文學論戰」之後，台灣新文學確實正式進入台灣文學的殿堂，姑且不論舊詩文的漢文學是否因為新文學的誕生而消跡，但是也產生了像賴和等幾位優秀的作家，而且他們終其一生始終以反帝、反封建的傳統。

1930 年黃石輝在《伍人報》上，發表〈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一文，正式開啟了「鄉土文學論爭」；因為「鄉土文學論爭」中所呈現關於「台灣式」或「台灣」等概念性的思考，也在台灣知識份子心中萌芽。〈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的文章中，可以非常明顯地讀到有關「台灣」的思考（中島利郎，2003：1）：

你是台灣人，你頭頂台灣天，腳踏台灣地，眼睛所看到的是台灣的狀況，耳孔所聽見的是台灣的消息，時間所歷的亦是台灣的經驗，嘴裡所說的亦是台灣的語言；所以你的那枝如椽的健筆，生花的筆彩，亦應該去寫台灣的文學了。

從以上資料看來，知識份子黃石輝所強調的正是「立足台灣、求取台灣經驗、書寫台灣」的三段式思考；其他還有「特別狀況的台灣，應該以台灣的語言來表現文學」之意。大致說來，黃石輝所定位的「鄉土文學」之中，「鄉土」一詞所涵蓋的範圍，完全是以「大眾」主體為對象所施行的，這是當年論爭的焦點，此議題的提出，也橫跨了整個論戰的主軸。雖然許多文學家書寫的對象，往往都是「在地經驗」或「幼少年物語」為主的敘述；但是對當時的台灣知識份子而言，「台灣經驗」的思考，可能還只是純屬日常經驗的敘述而已，「台灣空間」的強調也只是「想像共同體」的轉嫁而已。

隔年，黃石輝再度於《台灣新聞》上，發表〈再談鄉土文學〉一文，再一次定義「鄉土文學」的意涵。文章內表明了「鄉土文學就是語言的代表，既然各地有各地語言的狀況下，鄉土文學也是必要的」之意（中島利郎，2003：1）。逐次閱讀至 1931 年 8 月為止的《台灣新民報》，有關「鄉土文學」議題的討論清楚得知，雖然當時也有反對的意見，但是幾乎不是針對「提倡鄉土文學」的意見而反對，僅僅只是在「只有使用台灣語文」的看法上有分歧的看法。

擬似針對語言使用的「鄉土文學論爭」，實際上論爭的內容，所隱藏著主張台灣語言的「台灣派」和主張白話文的「中國派」的兩種思考，明白地存在於 1930 年代台灣知識分子的內心。終其最後，當時兩派的論爭雖然沒有具體的定論，但是限定「台灣」的場所、推廣「台灣式」文化的想法，普遍為當時知識階級的共識。

1932 年 5 月 10 日葉榮鐘（1932：2）持續在《南音》上提出論述，再一次發表〈提倡第三文學〉，針對「第三文學」提出以下的解釋：

我的想法中，社會集團就是依照人種、歷史、風土甚至人情的共通特性而形成的。這種特性是超越階級而存在的。因此，我們在形成

階級人之前，不先養成具備台灣人的特質是不行的。書寫第三文學之時，必須一邊意識到此特有的條件，應該對應全體台灣人的生活或感情來書寫文學。附帶地說，第三文學就是腳踏台灣的土地、頭頂台灣的天、不要模仿、不要追求流行性，真實地去感覺台灣人的血肉，才可創作文學。如此一來，可以抱持文學的自由性，我們也才可以達到完全的平等。

的確，風土和歷史等，是造成集團的條件，問題是這個「集團」是哪些要素形成的呢⁵？針對此疑問，葉榮鐘談到「集團的特性」，所指的就是台灣特殊的文化和社會狀況。雖然是有關文學書寫的敘述，但是我們以內容來判斷，葉所強調的「台灣」或「台灣文化」的概念，的確包含一種特殊的思想意涵（葉榮鐘，1932：2）；文章中提到「形成階級人之前的首要條件就是具備台灣人的特質」。可以說當時書寫「第三文學論」的要件，正是葉榮鐘強調，台灣人的「集團特性」和屬於「台灣的」特殊「民族性」的價值吧！

本來，團體主義的精神在定住土地的範圍是比較容易成立的。台灣知識分子書寫「第三文學論」時，強調的是同一集團內的「共通」經驗，此「台灣」類型本質的提出，涵蓋了對「台灣」之地的理性認識，同時也是清楚地把「台灣民族」文化的類型，當作是一種相對性的概念，與之前的認知做一種區分與告別。此概念的提出，被認為比「鄉土文學論爭」前段的論點，還更具實用性；也可以解釋在那個階段「台灣」的概念是完全被確立的。⁶

隨著日本國內政局的改變，1930年代末期「皇民化運動」的實施，甚至在進入1940年代之後，國家政策積極運作「戰爭協力」之時，文學作

⁵ 和辻哲郎（1979）提出有名的《風土論》，其中談到地緣共同體論的思想，敘述土地的共同是一種文化共同的概念，這也是一種人間空間性的問題。

⁶ 台灣「現代化」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概念就是「共同體概念」。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97）在其著作《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檢討了近現代關於民族、國家以及國民如何被想像、塑造，甚至改編；其中心思想認為所謂的國家、國民都是被建構在這些共同體想像的幻想中。安德森同時認為，這些幻想之所以可以在同一共同體中成型，無非就是依賴其資本主義的建構、印刷媒體、宗教革命、語言的普及等。

品和美術作品中，為何還呈現濃郁的「鄉土」色彩？我們以被稱為「風俗作家」張文環的作品，對照當時殖民政府的政策進一步來探討「風俗性」的意義。

首先，1941 年在《台灣文學》所刊載的〈藝旦之家〉；那是描寫藝旦彩雲半生的故事，故事主人翁是生存於台灣傳統社會中的養女。近代化過程中所進行的都市景像，透過小說的描繪生動地呈現出來。小說主人翁彩雲所居住都市的風景，呈現了近代都市的文化經驗；譬如現代化百貨公司、人力車以及婦女衣著方面，連裙長衣（洋裝）的登場，以及殖民地台灣人嚴守約會時間習慣等的描寫，現代化的都市風景，不但顯現出民眾心理對摩登的需求即渴望，也顯現出作家對「文明開化」的敏感度。

二十世紀存在於各個空間「民族意識」的問題，和現代化的連帶關係幾乎是一體兩面的思考；明治維新以來現代化的洗禮，對於日本來說就是一個嶄新的課題，尤其在第一次大戰之後日本的現代化更是如火如荼的進行著。明治之後的大正文化來說，從食衣住行到電影的娛樂事業，甚至日常生活休閒的生活方式，平日教養的問題及生活習慣等諸多問題無不涵蓋於其中（竹村民郎，1980）。對於民眾所存在的空間而言，都市系統的登場本來就是一個相對性的存在，街道的設置所蘊含的意義，也代表著一種民眾運動的展開（成田龍一，2003）。

對「新」知識分子的張文環而言，也是藉著作品〈藝旦之家〉中對都市的描寫，反射性地看到自己的「故鄉」，作家的思緒周旋於「鄉里」及「都市」的雙重結構的同時，也明白對自我文化提出反省⁷。「都市」與「鄉村」的對照性描寫，張文環在 1942 年出版的作品〈頓悟〉上同樣可以看到；作家藉著作品兩極化的描寫，敘述著對「鄉里」的危機意識。換言之，這是作家對「他鄉」的對抗意識，也正是對自我「鄉里」的意識化

⁷ 成田龍一（2003）的都市論中談到，日本都市的形成完全與政治與經濟的要因是息息相關的，而且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是在 1860 年代到 1900 年前後；第二期則是 1900 年到 1920 年甚至是到 1935 年之間達到鼎盛；第三期指的則是 1935 年到 1950 年前後為止。所謂的第三期正確來說指的就是戰爭時期的都市結構，是屬於比較「制度化」級「規範化」的都市空間。

和發現。其他，也有台灣傳統風月場所酒家所奉拜「豬哥神」的描寫；提到「神啊！請今天也幫我帶來好客人，有一大把鈔票的……」的說法（張文環，1991：179）。具備現代化知識的張文環，不但意有所指的指出，台灣傳統社會存在「養女制度」陋習的事實，也進一步描繪出知識份子對台灣現代社會都市應該具備均質化的強烈需求。

其他，1942 年 7 月在《台灣文學》上，所登載的就是作品〈閹雞〉（去勢的雞），同樣是描寫台灣傳統女性不幸遭遇的小說。小說內對台灣農村的傳統祭典，女性生存於傳統社會的宿命性人生，花了大篇幅的書寫。小說的主人翁月里，不顧父兄的反對，毅然的對自己的感情負責，作家筆下的主人翁，是一個敢愛敢恨的現代女性。

本來，張氏文學的特徵，有相當大的篇幅著眼於台灣傳統女性的描寫，男女自由戀愛下女方往往因為家庭因素而放棄自我的傳統，作家張文環往往透過作品有適度的批評。帝國統治下的十五年戰爭，根本就是一個總力戰的時代，國民總動員的戰時體制下，動員的對象當然也包括女性。戰爭時期婦人勞動的問題，需要具備戰爭協力的機能，因此一反過去傳統道德的基準，對婦女有更高的標準。也因此作家普遍給予女性「勞動」的形象，這種意識型態的表現，就是戰時體制下女性的位置。作家在自己作品中，批判東方傳統女性的價值觀及生活面相的同時，不但反映出當時台灣傳統社會重男輕女的普世價值，同時作家也呼應傳達了，戰爭時期日本家族制度中，賦與女性必須「健康」、「進步」的文化形象（東京歷史科学研究會婦人運動史部會，1991）。

大體而言，從 1941 年發表的〈論語與雞〉以來，作家透過主人翁傳統農村少年源的眼睛，批判了村民的陋習以及傳統私塾教師的不良行為，甚至在 1942 年 2 月所刊載的小說〈夜猿〉中，作家同樣是透過小說中主人翁的視線，陳述對台灣傳統社會的批判。主人翁的視線也無疑就是作家本人內心的關注點，故事的舞台隱射了作者自己的故鄉——嘉義梅山，小說內呈現的意象完全源自於作家本身的記憶；而此記憶的書寫與成年後身受「現代化」教育之後作家的意識是衝突的，對居住過東京經驗的張文環

來說，「近代」=「文明」的思考無疑是深植於作家內心深處。⁸

意外的，〈夜猿〉作品中所描寫的人物，完全是生活在無戰爭氛圍中台灣南部的山村，如同作家幼少年時期所成長的故鄉一般。作家無意於對戰爭的書寫，此無意識的書寫，如同電影停格的畫面，強調的只是平和的鄉下農村景像，顯然這種無意識的描寫，與文學外現實世界中所呈現戰火紛飛的氛圍也是格格不入的。

再怎麼說，戰時下張文環的作品，具備了強烈的「鄉土性」，一連串對自己故鄉嘉義的描寫，生動地呈現在讀者眼前。問題是，1940 年代是「皇民化運動」進行的如火如荼的時期；台灣社會在戰爭被動員的要求下，如此蘊含「台灣色彩」的文學，到底是如何通過官方檢驗的？接下來我們對照殖民當局的政策，檢討張氏文學作品中所潛藏的意識。

仔細閱讀 1941 年至 1943 年為止張氏的作品，可以清楚歸納以下的幾點要素（張修慎，2008）：

1. 描寫很多台灣風俗、習慣的場面。
2. 描寫很多生活於傳統台灣社會的女性。
3. 幾乎沒有戰爭的場面，只有許多傳統農村社會庶民生活的描寫。
4. 內容大都是以「家」為單位，透過主人翁的視線，作家隱約地表達了，對自己生長故鄉所擁有的「歸屬感」。

針對張氏文學中，不斷呈現「家」結構的描寫，乍看以為是無意識性的描寫；但是若仔細思考日本民族的基礎結構，可以看出「家」的涵義並非只是單純的意義而已。基本上，日本民族心中男性本位的思考中，所思考的根本核心一直是以「國」或「家」的結構，作為日本人團體意識的根本；這也是對個人所創出的狀態下所對應的統合概念，以及諸制度的確立等現況的呈現。

而且，日本大家長制的根源來自於日本民族內「家」的根本結構，日本研究者鹿野政直更詳細地指出，明治以來男性＝國、女性＝家的概念思

⁸ 「帝都東京」思想結構的形成早在明治新政府遷都東京以來，文明近代的象徵就已經形成。參考成田龍（2003）及佐藤康邦、安彥一惠（2005）。

考，是近代日本家族制度思考的根本。帝國框架下的單位本來就是以「家」作為基本的統合單位，強調「女性」的書寫就是生產動員之一。以日本人「家」的思想及強調「女性」的特質，在進入戰爭時期，的確具備總體戰的特殊意義。15 年戰爭開始之後，總力戰動員的奉公體制下，更賦予女性的特殊責任；譬如戰時婦人的勞働生活樣式中特別強調「女性」奉獻的精神，在進入 1940 年代之後，也成為統一帝國人民心理層面的基盤（成田龍，2003）。針對以上簡單地說明，也就是特定團體「國」所吸收合併「家」的基礎結構的思考。⁹

但是，至今為止的先行研究，對張氏文學作品中顯現「鄉土性」的檢討，大部分只停留於「寫實性的鄉土文學」、「描寫庶民的喜怒哀樂」、「潛在性存在的儒教信仰，完全不同於軍國主義的激動心情」（張恆豪，1991：10）等幾個層面。雖然也有「雖然張文環文學中沒有對殖民地提出正面的批判，對於小說中借用風俗性的手法批判台灣傳統的舊習俗」的說法（柳書琴，1996）¹⁰，幾乎所有的先行研究，僅對張文環文學中所顯現的「民俗風」的心情提出詮釋及分析，具體的關連性及成就此現象的原因尚無明確的說明。

另外，細數 1939 年 3 月之後開始實施的「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的目標，可以看到「物資的活用、消費的節約、勤勞的增進、儲蓄的實施」等四個實施要項（張修慎，2006；無作者，1984，中西鄉市，1940）。此四項內容不但與 1941 年總督府內，台灣警察協會出版的《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鷺巢敦哉，1941）的內容有高度的吻合，而且也都可以清楚看到帝國所要求「皇民化」的內容，與徹底改造古來台灣傳統惡習的要求的確有重疊之處。官方對傳統婦女的買賣及養女制度，甚至禁止荒唐無稽的習慣等條目的編列，可以發現其中的內容與張文環作品中所描繪對台灣傳統惡習的批判其精神是如出一轍的。

從以上資料的爬梳，我們可以認定戰時體制下的政策運作絕對是一個

⁹ 具體來說，形成日本「公社會」原理的公家法條，就是 1898 年的明治政府公布實行的民法第四編及第五編（親族、承續）的基本原理。參考鹿野政直（1992：202）。

¹⁰ 其他參考柳書琴、張文薰（2011）。

無法漠視的原因。資料顯示，1937 年日中戰爭開始之後，帝國強化戰爭體制的氛圍中，日本國內結合「內閣情報部」和「中央國民精神總動員聯盟」的氣勢，極力將文化統治及文學藝術列入「協力戰爭」的架構內。日本國內實施的統合方式，初期不外是「地方改良運動」和「教化總動員」的幾個路線。但是，到了 1930 年代後半，不同於前的方針，開始出現新的國民統合方式。甚至 1937 年日中戰爭開戰後，為了制約國民「戰爭協力」與否的問題，以「國家教化運動萬策」為基準的國民統合政策也日益加深¹¹。其中，1937 年 4 月在情報委員會常任幹事會中明訂「國民教化運動萬策」的項目就是其中之一；所標榜的宗旨不外乎就是，要求改善國民「日常生活的合理化、獎勵勤儉儲蓄」等幾個綱目，完全是宣揚日本肇國（建國）精神的內涵。

只是，張文環在作品中，顯現對傳統農村、舊慣、甚至對女性與「家」的描寫，與戰時日本所要求的「新生活運動」的主旨表面雖有吻合之處，但是其內涵所呈現的意義未必完全相同。帶著對「故鄉」懷念心情留日的作家，從日本返台之後，終究未曾再踏入故鄉之地。作家作品中呈現台灣農村社會「家」結構的現實時間，與統治者一方所呈現政治體的時間點也是有差異的，這也是台灣知識分子批判台灣社會後進性的具體現況。

初期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或許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顯見少許的差異，但是進入 1937 年「皇民化運動」時期之後，在帝國戰時體制氛圍的瀰漫下，「戰爭協力」既然成為國家統合的口號之後，可以清楚看到此現象已經逐漸消滅，殖民地知識分子可以論述的空間，也逐漸曖昧而模糊了。在必然的官方文學檢閱下，由於台日文化中共同的「儒教」因素，而使得張氏文學得以保留其「台灣式」的鄉土色彩。同時也因為作家本人深受「現代化」洗禮，身為知識份子對於傳統惡習的批判，無形中與日本帝國在戰時所強調「戰爭＝現代性」的思考有重疊的異曲同工之妙。

1937 年之後，帝國在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的政策之下，台灣內部的確面臨了非常深刻的課題；也就是「皇民化運動」之後，是否就完成「現

¹¹ 「國民精神總動員第二回強調週間實施要綱」（石川準吉，1976；酒井三郎，1992）。

代化」的疑問。戰時台灣的鄉土文學，內容呈現對傳統舊慣批判的意識與帝國實施「皇民化運動」的主旨，所欲求「現代化」的意念有吻合之處，兩方督導台灣傳統民俗舊慣的心情也是重疊的。顯然殖民地台灣作家在「戰爭協力」的總動員下，唯一可以運用的謀略，只能選擇和帝國「傳統」（儒教）相同的部分。換言之，日本在1930年代，普遍吹起「傳統回歸」思想的本質中，內含同樣「鄉土」的元素，正是進入1940年代，殖民地作家被要求「動員戰爭」之下，巧妙運用「鄉土」記憶的理由。

肆、戰爭時期「鄉土意識」的本質：

《民俗台灣》的創刊與台灣知識份子的對應

除了文學作品中顯現出的「鄉土色彩」之外，1941年台灣島內也出版了《民俗台灣》雜誌，雜誌內容都是有關漢民族風俗習慣的書寫。即便帝國在領台之初，已有官方主導調查的《台灣慣習記事》的內容，其內容的性質亦由《民俗台灣》所繼承；但是對於兩雜誌的性質，筆者一致認為還是有基本性的差異（張修慎，2007）。其原因在於進入1937年之後，總督府依照「皇民化運動」的方針，企圖強烈「同化」台灣人的同時，《民俗台灣》是否仍然是單純的民俗記錄？戰爭時期《民俗台灣》的發刊，雜誌的本質所對應的台灣知識份子的態度，其對應的本質性思考，當然就是台灣知識份子對「鄉土意識」的解釋。

一般而言，「民俗」指的就是表現在日常生活中，民間珍奇的風俗和鄉土的風習；廣義來說，也意味著地域鄉土集團所代表民族的傳承文化。綜合以上的概念，關於戰前台灣的「民俗」，我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雜誌《民俗台灣》。為期三年的民俗記錄，記載了台灣漢民族風俗習慣；但是對於先住民「高砂族」等的相關研究、調查、關係報告書等，幾乎是少見的。

當時活動於《民俗台灣》內的台日雙方人馬曾經引起有關「旨趣書的論爭」的討論，當年的討論也被認為是理解戰前台灣知識份子的貴重資料。1941年雜誌《民俗台灣》創刊之際，亞洲正逢非常時期，也正是日本「國

體」觀念盛行的年代。如此險峻的政治情況下，台灣文化界普遍也身陷此不自主的創作環境中。目前為止，學者對於領台之初，帝國對台灣舊慣調查記錄《慣習旧事》的出版，指出帝國所執著的重點應該在「統治方便」的考量（張隆志，2006）。

問題是，進入 1930 年代後期，「皇民化運動」已經開始實施，帝國正努力深化「日本文化」、努力建構「皇民」的當時；甚至進入 1940 年代「大東亞共榮圈」的時期之後，台灣總督府允許記錄南方舊事慣習《民俗台灣》的發行，難道與當時懷著「統治方便」的初衷還是相同的嗎？帝國積極推行「戰爭協力」之際，戰時下台灣知識份子抱持如何的「鄉土」概念，參與《民俗台灣》的書寫，也是了解戰時台灣知識份子思想的指標之一。

本來，日本「民俗學」的活動與民族主義的關係，在日本近代文化研究的領域內，如何適度地整理、說明的方法上，始終是備受爭議。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一直是以國家萬能為主要目標。但是，到了明治末期的階段，跟隨帝國「海外進出」的策略，對「地方」及「鄉土」議題的關心也日益高漲。隨著帝國主義局勢和既出政策的發展，在殖民地具備需要與日本文化相關論述的迫切性也逐漸加深。其中台灣「民俗學」所內含的實質意義及發展的過程，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一開始，兒玉總督時代的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計畫性的「經營」台灣，所留下當時的文獻紀錄，可以看到當年非常清晰的台灣舊慣、習俗等生活記錄；此龐大的調查記錄，當然就成為日後殖民政府「治台」的參考依據。人類學者伊能嘉矩來台灣調查時所做的「人類學研究」，仍然還是以官方所主導計畫性的「踏查事業」。同時日本國內從 1920 年代開始，由柳田國男統合當時殖民地調查所屬的民族或民俗的團體，嘗試編輯相關性的雜誌。日本國內在 1925 年雜誌《民俗》創刊之際，極力宣揚「不限定以民俗為範圍的學問是不行的野心」，之後的《民俗》雜誌則完全是源自柳田維繫自我倡導的「民間傳承」；而且是以「鄉土研究」（國家村社）為中心的思考，同時具備完備日本民族（national）的獨特意識。

回顧 1935 年 1 月所成立日本民族學會時，初期會報的旨趣書中，可

以明白對應時代的變遷、伴隨著國家主義擴張的時代，追求民族學自立性的宗旨是相當明顯的。其中（無作者，1935）：

……加上，最近世界各國澎湃的民族主義氣勢中，重新要求對民族本身再一次的認識。而且民族的成立及特異性，同屬於歷史及社會的範疇。……我們為了了解自己社會生活及此本質，理解民族學更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我國的民族學研究至今為止在許多民俗學上，主要是以鄉土研究的方向發展，在日本殘存文化的採集及解說上有諸多的貢獻。但是，更加以此集大成，與其他的民族文化的特徵比較，闡明相互的系統關係，從文化的發生到接觸傳播的理法上去思考研究，當然海外的民俗學的伸展也是當然必須被要求的。……。

從以上文脈的觀察可以看到帝國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日本文化人類學轉變的脈絡；一開始的鄉土性方向，因為民族的擴大整編中，必須融入各民族文化的特徵，闡明相互之間的相異性，也是民族融合的一個參考。1930 年代開始之後，「民族」所代表的意義也逐漸擴大而強烈。藉以「五族共和」為口號建立了滿州國，日本正式進入一個完全以「民族」概念為考量的時代。其過程與台灣直接相關的就是，1928 年結合地方組織而成立的台北帝大文政學部的土俗人類學教室。大致說來，初期台灣的民族研究，完全以現地調查為目標，以原住民的研究為方向，其調查研究的範圍，和日本殖民地政策具有相輔相成之效。

除此之外，日本文部省（教育部）所主導的「鄉土教育運動」也正熱絡地展開。以「為了組織性採集及研究方法為目的的會員聯絡」為旨趣所結成的「民間傳承會」，完全繼承了柳田國男的方法論。1940 年代，廣泛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構上，「民族」統合的策略中，日本民俗學所具備的本質，「鄉土意識」應該還是必須考慮的要素吧！我們合理推測，終至 1940 年代前半為止，日本所呈現「民俗學」的樣態，考慮當時日本「民間傳承會」急遽成長的原因，同時代「國粹主義」的吶喊之下，極力促成了各地「鄉土教育」網絡的建構。

但是，一向被肯定的雜誌《民俗台灣》，經過幾十年的歲月，為何評價是如此兩極¹²？可以說，當年「旨趣書論爭」的內容，有機會追尋當時活動於《民俗台灣》中，台日知識份子對「台灣民俗」的看法。1941 年《民俗台灣》創刊之際，從金關書寫「旨趣書」的部分，內容所呈現的字義，明白可以看出帝國湮滅台灣舊慣，也在所不惜的理由。資料中可以看到，1937 年之後台灣實施的「皇民化」政策中，其中欲求「現代化」就是一個主軸；而金關思考打破本島舊慣陋習的必要，就是成為日本「文明國民」的義務。¹³

對金關所發表的言論，當時台灣文學者的楊雲萍，馬上做了相關的回應。做為台灣知識份子的楊雲萍，對金關所提出肯定「皇民化」意見的說法提出反駁。楊雲萍（1941：43）在文章內提示日本人研究台灣應具備的態度，表明「研究事務上，必要追求冷靜、客觀的科學性態度……絕不是意味著乘坐高飛車的態度或機械性的方法。勿寧說，我們是偉大學者的同時，感應愛與謙遜，搜取 humanity。」的看法。

楊以宗主國人民金關的立場來思考，認定其必須理解台灣民俗的理由，儘管包含著他個人的喜愛；但是基本上戰爭體制之下，日本國家架構下全民優先考慮的條件，還是必須配合的國的政策，也就是在日本南進政策中，基於求取「地政學」需要的方便罷了。本來，日本在領台之後，實施諸多的「同化政策」；其中「台灣慣習研究會」或「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等各種組織存在的理由，正是日本在進行大陸政策的途中，賦予殖民地台灣「日華提攜」的使命。創造「大東亞共榮圈」不只是政治領土的收編而已，帝國主義瀰漫的情勢中，進一步文化統合的迫切性也深及日本知識分子的心中，這正是日本帝國一貫的思考——「亞洲主義」的連鎖。¹⁴

¹² 戰爭時期所發行的雜誌《民俗台灣》，從戰前到戰後始終受到極高的評價。但是，到了川村湊出版《「大東亞民俗學」の虛実》（1977）以來，一轉先前的評價，得到兩極化的評價。

¹³ 有關台日雙方知識份子金關丈夫及楊雲萍的論爭始末，請參考《民俗台灣》第 1 卷第 2 號（無作者，1943：42）。其他關於《民俗台灣》台日兩方看法不同的論述，已另文敘述，本文不再重複，請參考張修慎（2007）。

¹⁴ 關於「亞洲主義」的議論，在 1920 年代的《台灣日報》上，可以解讀到台灣知識份子的主張（張修慎，2004）。

換言之，「國體」強化的時代，日本全國人民站在「大東亞共榮」極端政治思考的框架下，除了強調殖民地台灣民俗研究的「實務」和「實用性」之外，並無其他的考量。以當年台日雙方的議論看來，明白反映了從 1937 年之後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後，殖民與被殖民的兩面情，同時牽扯出台日雙方在「皇民化」＝「現代化」的邏輯思考中，殖民者一方對台灣民俗的態度。

雖然，戰後楊雲萍對戰前的這場論爭的內容提出辯解，1952 年 9 月《台灣風物》第 2 卷第 6 期題為〈關於民俗改善〉的文章中，可以明白解讀到楊雲萍對「台灣民俗」的態度¹⁵。但是，因為戰前戰後台灣政治體制的改變，處理戰前有關《民俗台灣》中「旨趣書」議題的本質時，我們仍然持著保留的態度（吳密察，2008）。因為，依照當時帝國政府堅持在台灣實施「皇民化運動」的理由看來，也和金閔思考台灣人理當歡迎「現代化」運作的理由不謀而合，其思考的核心問題，仍然不離「皇民化」＝「現代化」的基本邏輯。

對台灣來說，進入 1930 年代的戰爭時期，台灣人普遍必須面對的就是，「皇民」＝「日本臣民」＝「日本化」等深刻的問題。因此，欲理解戰時台灣的狀況，「皇民化運動」存在的政治性意義，絕對是無法漠視必須要面對的重要因素。

如果我們所思考「皇民化」＝「現代化」的命題是成立的話；那麼 1930 年代後期所面對有關「現代化」的問題並不限於台灣，對日本文化的反省也包含其中。而且，依照「皇民化運動」所執著，雜誌《民俗台灣》的存在，也確實反映了有關官方「內台如一」的口號。

¹⁵ 主編楊雲萍在卷頭語中說明，「1.此次當局為厲行節約，改善民俗，採取各種步驟，又頒訂「取締注意事項十點」……只以本誌刊行旨趣之一，則在記錄採集及研究本省之民俗，用以促進民俗之合理的改善。2.要改善「民俗」，當然要認清將要「改善」的「民俗」之本質，一鄉，一鎮，一省乃至一國的「民俗」，皆有其歷史的，地理的條件，存乎其內。3.「民俗」是幾許先民的生活之一種「結晶」……。雖因「時過境遷」，有的智慧，會變為所謂愚陋；倫理，經驗或行動，反成為所謂社會進步的阻礙。但是，想到何為「智慧」？何為「愚陋」？或何為「社會進步的阻礙」？則問題似乎並非那麼簡單。」其他參照洪淑苓（2011）。

即使，1937 年實施「皇民化運動」之後，帝國提倡以「文明・同化」為基準，主張「淨化」成為「內台一體」的國策，即便是民俗學的研究，也是無可避免思想的支配與被支配的局面。因此，「皇民化運動」必須實施的政治條件下，《民俗台灣》所蘊含的實質意義，在戰前與戰後引起各方的討論，或許也是不可抗拒的現實。

再一次仔細翻閱從第 1 卷開始的《民俗台灣》，卷頭語中可以看出日本人書寫「台灣民俗」的特殊意義。其中，「1940 年代正是日本帝國，背負南進大使命之際，對於「台灣民俗」的了解，也正是提供日本民族反省機會」（岡田謙，1941），的說法。「特別是進入 1940 年代「大東亞共榮圈」的時期，對圈內為主導者立場的日本帝國而言，民族指導首先必要了解的急務，就是各國的歷史、傳統，即有形到無形的支配民族心理要素層面的根本」（早坂一郎，1942）。其他，「特定「民俗」的研究或許一開始並非日本帝國所期盼的方針；但是了解各地的「民俗」，用比較的方法達到「民俗淨化」的作用才是目標」的說法也非常明確（宮崎孝治郎，1942）。

雜誌的編輯後記上所記述的一般，「本雜誌的反響意外的大，從基本島內，遠至內地、滿州國、中華民國隨之響應，編輯部是心存感激的。特別是得到多數本島人的支持，從本誌的使命看來也是相當值得慶賀的事情」（瀧田貞治，1942）。對於台灣舊慣的了解，內地人到底不如本島人，考慮台灣舊慣是否存續的問題時，理當考慮的必然要素，當然就是當時環境下考量國家價值、思考「總體戰體制」的運作。也因此了解台灣民俗，當然必然成為與「內台一體化」的要素，此地理性、地方性方便的考量，也就是為何金關依照「內台如一」的口號書寫的旨趣書，成為日後川村批判焦點的理由。

隨著戰爭進行所帶來的變化；思考「至少止於無限定的範圍上，我們大和民族是擁有很大的天真之情。真的抱持「日本性性格」的宗教對策就是，建立在所需要的自覺之上。」的說法（渡野安太郎，1941），其內容還是傾向於以「國體」概念為中心的主軸。甚至，1942 年 7 月 5 日 13 號的卷頭上，也明白記載著以下的說法：「以我們處身於大戰爭的當頭的事

實為前提來思考，與其他研究併行思考的就是，特別是民族的風習、習慣相關的研究上，這就是現行民族政策的實踐，判斷這也是以最高命令所要求的。……大東亞戰爭是基於資源戰爭的民族政策戰。沒有比今天的民族學研究更大。」（楠井隆三，1942）

如此對照相關的文面資料，我們可以清楚得知，當時日本帝國的「民族學」已經不是單純的學問性研究，以「日本民族」為中心，傾向以大東亞基盤為方向的目標已經逐漸鮮明。記事中也明白記載著，「不要誤導民族，引領民族完成百年大計，更是應該通曉民俗之事以此為根幹不可。而且更應廣知善鄰，要把南方各民族包容在一大共榮圈的個郡之下，更是民族研究者的大責任，真正的意思，更是可以稱為引領時代前端之業。」的方向也是相當明確的（森於菟，1943）。

之外，讓人矚目的在 1943 年 12 月《民俗台灣》的記錄中，題為〈大東亞民俗學と《民俗台灣》の使命〉的文章（無作者，1943）。當時圍繞著訪台的柳田国男，所舉辦的座談會中，參加者還有中村哲、金關丈夫、岡田謙和橋浦泰雄的五人。座談會中，金關首先對柳田提出，「在日本民俗學或是大東亞民俗學上，對台灣民俗研究的期待是什麼？」的問題。當時柳田的回答不如預期的明快，柳田為何沒有具體對《民俗台灣》提出建言的理由，至今在當年的文獻記錄上是無法得知的。但是，以台灣為殖民地的政治角色來思考，以比較民俗學或共通民俗學的方法上，賦予《民俗台灣》的使命是比較樂觀可見的。以當時的國際政治情勢來判斷，攸關「台灣民俗」相關記錄的領域，涵蓋於「大東亞共榮圈」的範圍內，也是不可置疑的事實吧！

儘管如此，在當時的政治現實中，殖民地台灣的知識份子，到底是以如何的心境來面對《民俗台灣》的書寫？若再度整理《民俗台灣》的內容時，我們明顯可以區分幾個領域。不管台灣人生活的語言（諺語及俗語）或從日常生活用品有形物開始，到有關信仰和習俗的抽象記錄都涵括其中（陳艷紅，2006）。台灣人的投稿，除了器物、慣習的介紹之外，其他台灣各地名典故的介紹也在其中。其他所涉獵最大的議題，還包括寄存於台灣的「養女制度」及「婚姻制度」的批判。集中在第 3 卷第 11 號的目次

中，舉凡有張文環的〈老娼撲滅論〉、吳新榮的〈媳婦仔螺〉、陳昭馨的〈童養媳〉、呂赫若的〈媳婦仔の場合〉、楊千鶴的〈女の宿命〉等；其他也如連溫卿、黃啟瑞、黃連發、張建彬等，一致批評了存在於台灣的陋習——女性地位的問題。

遵循以上的脈絡，對應台灣知識分子所列舉的細目，我們重新翻閱 1941 年台灣總督府內警察協會出版的《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的內容時，可以看到總督府強烈要求台灣島民日常生活改善的綱要。對照其中與《民俗台灣》的書寫內容，其內容的吻合度也是相當高的。譬如《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的內容中，有三個項目很清楚（鷺巢敦哉，1941：302-303）：

1. 大家族中媳婦仔的弊害。
2. 婦女買賣的惡例。
3. 台灣社會中，結婚制度中聘金等項目的實施。

儘管台灣知識份子，鮮少對「台灣民俗」的意義提出直接的看法，但是作家在許多作品中所安排的角色及環境氛圍都意有所指地往同一個方向驅指，那就是針對現存於台灣傳統社會中惡習舊慣的批判，台灣知識分子冀求「現代化」的心情和官方「皇民化運動」中所內含要求「新生活」的目標，本質上是相當一致的。

「皇民化運動」的政治作用，根本就是一種統合殖民地人民的手段；特別是在進入 1937 年的日中戰爭之後，藉著「皇民化運動」中日常生活的革新，完全是日本帝國欲圖切斷中國因緣的線索，同時也是改造台灣人成為帝國臣民的手段。《民俗台灣》的旨趣書上，言明有關「陋習舊慣」的內容，無非就是中國文化罷了！但是，對於深受「現代化」洗禮的 1940 年代的台灣青年而言，欲去除台灣傳統中「舊慣陋習」的因素，其實正是身為知識青年的使命吧！

伍、結語

歷史現實中，台灣歷經日本帝國 50 年的統治，「台灣意識」的消長完全是侷限在殖民政策的範圍內產生變動。思想意識的變動看似能在作品

中分析；但是 1945 年戰後政權的再度轉換，不同的立場因為人為的因素多少也左右了其中的解釋。1920 年代，台灣正致力於製作自己的歷史空間之際，因為台灣本身歷史的條件，加上來自宗主國的種種壓抑，很難看出「台灣意識」的定型化。進入 1930 年代之後情勢更加險峻，東亞歷史走入一個戰亂的年代，1937 年所實施的「皇民化運動」，對台灣知識階級留下多少影響，至今也尚未有一個確定的輪廓。

由以上的各種資料的爬梳之後，如同川村所指責的一般，《民俗台灣》的旨趣書上所強調「強調實務和實用性」的思惟，與當時日本政治現況下的要求是息息相關的（川村湊，1997）。對於 1940 年代，在「皇民化運動」的要求下，台灣知識份子被要求是否「戰爭協力」的問題上，隱藏著台灣知識份子本身追求的「現代化」的要素。對《民俗台灣》中富含「鄉土」或「地方性」的書寫，其實與日本本身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尤其是進入 1940 年代之後日本帝國本身所企求「傳統回歸」的政治性需求，有必然一脈相承的邏輯性。

同樣的鄉土議題，1930 年代台灣知識分子論戰「鄉土文學論爭」索求的重點，和 1940 年代台日知識分子所需求的層面和意義明顯的不同。檢閱台灣知識分子的「民族意識」的生成與變化，顯然與日本殖民情境下的變動也是密不可分的。戰時下，雖然台灣的舊慣未必是陋習，但是犧牲台灣民俗要素也無妨的理由，完全是因為帝國必須南進，對殖民地文化的要求，必須統合於「日本文化」的框架內。

總括各方的觀察，日本帝國必須了解「台灣民俗」的最大目的，正是維繫大東亞文化統一的目標。不管「民俗」或「民藝」調查的內容，確實與統治初期的「舊慣調查」有幾許的相似之處。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衛文內閣成立之後，從近衛新體制政策所規範的「文化政策要綱」看來，制約文化人所列舉的「思想對策」要綱；包含了「國體觀念的明示」、「透過國民生活的體驗徹底實施」的幾個項目是相當明確的。而且，隨著南方軍政的推展，總督府除了思考確保台灣治安之外，對當時帝國國土推展的文化統合的效率上，所偏頗注意的重點，當然就是得到住民的協力，極力貫穿效達「日本文化」的根本。

對於帝國欲求殖民地文化，統合回歸於「日本文化」的考量上，當然是不容忽視的。實際上，有關「新生活文化的諸問題」的課題中，明顯包含了「日本精神和日本生活」的項目。而且，日中戰爭開始之後，依照政府的「指導」為前提，終究就是非常強調如何加深所謂「日本性」的要素¹⁶；而此基本方針及做法，對於開始實施「皇民化運動」後的殖民地台灣更是無法例外。

關於這一點，如同我們分析《民俗台灣》雜誌上的「旨趣議論」一般，台日知識份子思考的複雜性也是明白可見的。活動於《民俗台灣》中的台灣知識份子批判傳統陋習的本意，和追求「現代化」的邏輯不但具有一致性；而且，台灣知識份子所追求的「現代化思想」，與「皇民化運動」中所蘊含「近代文明」的意義再度重疊。以帝國的立場來說，犧牲台灣傳統陋習舊慣，正是使台灣脫中國化的要素，對倡導「大東亞共榮圈」為口號的日本帝國而言更是求之不得的。

換言之，戰爭資源逐漸險峻的時代中，「大政翼贊會」所強調的就是「鄉土的傳統和地方特殊性的強調」以及「做為地方農村社會性集團」等，「振興地方文化」的企圖心也是明顯的。可以說，1940 年代日本「鄉土運動」所堅持的「地方性」（鄉土性）要素的問題，同樣不只限於殖民地的台灣。對於日本邁向現代化過程中，尤其是 1930 年代戰爭開始之後，甚至進入 1940 年代，日本文化界上下吹盪，有關「近代的超克」思考的同時，隱藏著日本知識份子對「日本文化回歸」的需求。不管「民俗」或是「民藝」的問題，日本知識份子對這些知性問題的探究，正是日本強化「國體論」的年代，其思想政策運作的根源，同樣也是帝國欲求統合於「大東亞共榮圈」的思考之下吧！

戰時發行的雜誌《民俗台灣》，所具備的特質的問題，看來與統治者

¹⁶ 藉著民俗議題的討論顯現「鄉土意識」之外，1942 年 2 月開始日本出版的《月刊民藝・民藝》雜誌上，舉行了〈新生活文化諸問題〉的座談會，其中的議題包括了以下幾個論點：〈日本精神と日本の生活〉、〈日本軍隊の生活文化〉、〈国民服の問題〉、〈手工芸と機械工芸〉、〈手工芸の民族精神〉、〈工芸文化組織と個人作家〉、〈新体制と民芸運動〉、〈地方文化と中央文化〉，顯現日本國家政策內凸顯「鄉土意識」範圍之廣泛。參照張修慎（2012）。

當時的政策是息息相關，即使到今天，戰時有關台日知識分子的問題，還留下許多欲待解析的空間。1940 年代前半開始，從各地實施的民俗（鄉土題材）調查來看，「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體系內，的確包含了許多無法與殖民地相提並論的地理空間。台灣在 1941 年推進「皇民化運動」時間點所創刊的《民俗台灣》，終究無法避免捲入「大東亞共榮圈」的結構中，所內含關於日本民族所思考的「文明化」＝「同化」的思考。我們批評戰前日本文化本質變化的同時，同時也看到戰爭時期台灣「鄉土意識」的編制與創作力的樣態，當年留下龐大的內容，也提供今天欲圖復興台灣傳統文化的好素材。

參考書目

- Benedict Anderson (白石さや・白石隆譯)，1997。《想像の共同體》。東京：NTT出版。
- 吳宏明，1983。〈台灣における書房教育の一考察—その実態と変遷—〉《木野評論》14號，頁46。
- 吳密察，2008。〈《民俗台灣》發刊的時代背景及其性質〉《帝國裡的「地方文化」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化狀況》。台北：播種者出版。
- 黃美娥，2006。〈從「詩歌」到「小說」：日治初期台灣文學知識新秩序的形成〉收於《跨領域的台灣文學研究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出版。
- 伊能嘉矩，1965。《台灣文化志 中》。東京：刀江書院。
- 岡田謙，1941。〈南進台灣〉《民俗台灣》1卷3號，頁1。
- 関口敏美，1995。《柳田国男における「学問」の展開と教育観の形成》。東京：風間書房。
- 宮崎孝治郎，1942。〈卷頭語〉《民俗台灣》2卷6號，頁1。
- 洪淑苓，2011。〈1950年代台灣民俗刊物的內容取向及其意涵——以《台灣風物》雜誌暨期卷1至卷9為例〉《東華漢學》夏季特刊，頁261-94。
- 高山岩男，1941。《文化類型學研究》。東京：弘文堂書房。
- 国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編），1937。《国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事業概要》。東京：国民精神總動員中央聯盟。
- 佐藤康邦、安彦一恵（編），2005。《風景の哲學》。東京：ナカニシヤ出版。
- 佐藤道信，1999。《明治国家と近代美術》。東京：吉川弘文館。
- 坂野徹，2005。《帝国日本と人類学者》。東京：勁草書房。
- 鹿野政直，1992。《戰前・「家」的思考》。東京：創文社。
- 酒井三郎，1992。《昭和研究会》。東京：中公文庫。
- 松田京子，1997。〈領台初期における台灣原住民調査—伊能嘉矩を中心に〉《台灣史研究》14期，頁135-48。
- 森於菟，1942。〈卷頭語〉《民俗台灣》2卷12號，頁1。
- 成田龍一，2000。《故郷の喪失と再生》。東京：青弓社。
- 成田龍一，2003。《近代都市空間の文化経験》。東京：岩波書店。
- 石川準吉，1976。《國家總動員史，資料編第四》。東京：國家總動員史刊行會。
- 川村湊，1976。《「大東亜民俗学」の虚実》。東京：講談社。

- 早坂一郎，1942。〈指導者の心構へ〉《民俗台灣》2卷2號，頁1。
- 瀧田貞治，1942。〈台灣における旧慣の存否を決するもの〉《民俗台灣》2卷8號，頁1。
- 竹村民郎，1980。《大正文化》。東京：講談社。
- 中西郷市，1940。《大正翼賛読本》。東京：刀江書院。
- 中島利郎（編），2003。《1930年代台灣郷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出版社。
- 張修慎，2006。〈日本「近代の超克」の思想と戦時下台湾知識人の諸相〉《台大日本語文研究》11集，頁1-38。
- 張修慎，2007。〈戦争時期台灣知識份子心中關於「民俗」的思考〉《台灣人文生態研究》9卷2集，頁1-20。
- 張修慎，2012。《戦時下台湾における「郷土意識」と柳宗悦の「民芸思想」—雑誌『民俗台湾』と『月刊民芸・民芸』との比較—》《桃山歴史・地理》47號，頁38-67。
- 張修慎，2004。〈台湾知識人における「大東亜共栄圏」という思想—日本同時代の「知識人」の接点—〉《日本学と台湾学》3號，頁117-53。
- 張修慎，2008。〈台灣的「現代性」、「郷土文化」與日本「近代的超克」思想。
- 張文環，1991。〈頓悟〉《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張文環集》頁179-97。台北：前衛出版社。
- 張隆志，2006。〈從「舊慣」到「民俗」：日本近代知識生產與殖民地台灣的文化政治〉《台灣文學研究季刊》2期，頁33-58。
- 張恆豪，1991。〈人道關懷的風俗畫—張文環集序〉收於《台灣作家全集・短篇小說卷／日據時代—張文環集》頁10。台北：前衛出版社。
- 陳昭瑛，1999。《台灣與傳統文化》。台北：台灣書店。
- 陳其南，1987。《台灣的傳統中國社會》。台北：允晨出版社。
- 陳艷紅，2006。《《民俗台灣》と日本人》。台北：致良出版社。
- 田畑久男，1997。《民族學者鳥居竜藏—アジア調査の軌跡》。東京：古今書院。
- 渡野安太郎，1941。〈卷頭語：宗教對策〉《民俗台灣》1卷2號，頁1。
- 東京歴史科学研究会婦人運動史部会（編），1991。《昭和史叢書 女と戦争—戦争は 女の生活をどう変えたか》。東京：東京歴史科学研究会婦人運動史部会。
- 楠井隆三，1942。〈卷頭語〉《民俗台灣》2卷7號，頁1。
- 飛鳥井雅道，2002。《日本近代精神史の研究》。東京：東京大学學術出版会。
- 末成道男（編），2003。《池田敏雄台灣民俗著作集》（上）。東京：綠蔭書房。

- 無作者，1935。〈日本民族學會設立趣意書〉《民俗學研究》1 卷 1 號，頁 219-20。
- 無作者，1941。〈生活文化の諸問題〉（座談会）《月刊民芸・民芸》3 卷第 5 號，頁 2-21。
- 無作者，1943。〈柳田國男を囲みて：大東亜民俗学の建設と《民俗台灣》の使命〉（座談会）《民俗台灣》3 卷 12 號，頁 2-14。
- 無作者，1984（1954）。〈国民精神總動員新展開の基本方針〉收於吉田裕、吉見義明（編）《資料日本現代史，10》頁 97-98。東京：大月書局。
- 野村純一・宮田登等（編），1998。《柳田國男事典》。東京：勉誠出版。
- 柳書琴、張文薰（編），2011。《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 06，張文環（1909-1978）》。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出版。
- 柳書琴，1996。〈謎一樣的張文環——日治末期張文環小說中的民俗風〉收於《第二屆台灣本土國際學書研討會論文集》。
- 楊雲萍，1941。〈研究と愛〉《民俗台灣》1 卷 2 號，頁 43。
- 葉榮鐘，1932。〈提倡第三文學〉《南音》1 卷 8 號，頁 2。
- 和辻哲郎，1979。《風土論》。
- 鷺巢敦哉，1941。《台灣保甲皇民化讀本》。台北：台灣總督府台灣警察協會。
- 廖毓文，1979。〈台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收於李南衡（編）《文獻資料選集，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明集 5》頁 458-96。台北：明潭出版社。
- 顏娟英，2004。《風景心境 上下 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台北：雄獅美術。

The Essence of Taiwanese Native Consciousness: From the Native Literature Debates to *Folklore Taiwan*

Hsiu-Sheng Cha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rovidence University, Salu, Taichung, TAIWAN*

Abstrac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910's, the vicissitude of Taiwanese "Native Consciousness" went through many alteration and obstacles. From the "Native Literature Debates" in the early 1930's, we can clearly see the subjective connection of Taiwanese intellectual thoughts of "Native" equivalent to "Taiwan." Since the outbreak of Sino-Japanese war in 1937, Taiwanese were set forced to "Kominka Movement" The most notable writer and journal regarding "Native Consciousness" were Wen-Huan Chang and *Folklore Taiwan* published in 1941. It's interest to find out the linkage between the colorful expression of "Locality" and "Native Consciousness" by the Taiwanese cultural circle and the essence of "Native Movement" stressed by Imperial Japan. The subject of "Native Literature" and "Folk Crafts" entered at the wartime. "Eradication of Taiwanization" before the war is the main subject that Japanese Empire has to be faced on the premise of war synthesis. Under the political atmosphere, the "Native" literary works of Taiwanese cultural circle which appeared after 1941 were obviously not a simple one. This paper intends to study the relation of flow and subordination betwee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and "Native Consciousness" expressed by prewar intellectuals.

Keywords: *Folklore Taiwan*, Wen-Huan Chang, native consciousness,
native consciousness